

## 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述评与探索

作者: 张振江 文章来源: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 2009-3-4

根据中、英文语料和研究文献,对中国洋泾浜英语(CPE)研究主要领域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进展进行评述,并就某些问题展开简短探索。

近代,汉语与外语接触,形成了一种以汉语和英语来源的成分为主要成分的有限混合口语。(注:“有限”的含义,见佐伊基,1989:83,参考ennys,1878。)约1720年至约1950年,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可听到这种语言,当时称为“番话”、“广东番话”、“洋泾浜”、“别琴”等,英语文献中称之为Chinese broken English、Canton English、China Coast English、Pidgin(注:一般认为Pidgin是business的广州话讹误发音,Downing(1838, v. 2: 295)似乎是最早的解释,又参考Hall, 1955: 30~31。Whinnom(1971)、Ferguson & DeBose(1977)认为CPE是creole或lingua franca;周振鹤(1998: 202~203)、吴义雄(2001)主张将CPE分称为“广东/广州英语”、“洋泾浜英语”,本文均不从。)English等。当代,汉语文献一般称之为洋泾浜英语,英语文献一般称之为Chinese Pidgin English。本文称之为中国洋泾浜英语,简称CPE。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洋泾浜英语之一、太平洋地区最古老的洋泾浜英语(Hall, 1955: 15, 28~29; Holm, 1988~1989, v. 2:512~517; Selby & Selby, 1997; Mühlh usler, 1996: 28),CPE在世界洋泾浜语言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文中,我们根据中、英文文献(截至2002年底,个别文献例外),对CPE研究的主要进展进行评述,并对某些问题展开我们的简要探索。

### 一、资料与一般研究评述

中、英文文献所反映出来的CPE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和研究工作,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

中文文献中少见CPE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最近才有人开始留意,如周振鹤(1996,1998)所进行的考释、还原工作。而在实际上,成于清代、民初的许多资料中常有可用材料。例如,张海鹏(1995:591)提到,清代徽商江有科的一册札记中有江有科从1827年起在广州从事茶叶生意抄录的、用汉字注明音、义的英语对照材料,总计多达数百条,学术界迄今没有使用。此外,清代、民初也留下了一些CPE教学材料和CPE创作料,也同样不为人知,更加缺乏搜集、整理。CPE中文资料工作任重道远。

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只有陈原较多地涉及了CPE。陈原(1979:53)指它为“语言污染之极致”,带有浓厚的价值评价色彩,反映当时中国学术界对CPE偏于负面的认识。1980年后,评价、介绍工作增加,而且价值评价开始向学术评价转变。例如,叶蜚声、徐通锵(1981)进行了颇为客观、准确的介绍;陈松岑(1985:96)的简短评论,虽然可能不尽准确,但已不见价值评价色彩;而游汝杰、周振鹤(1986)的简短引用、介绍,使CPE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注意。1990年之后,研究工作增加,周振鹤(1996,1998)的论著,主要以上海地区的CPE为对象,兼及广东地区,进行了研究,章文钦(1994)、刘圣宜和宋德华(1996)、吴义雄(2001)、张振江(1999,2001,2003)主要以广东和香港地区的CPE为对象进行了探讨。从总体上看,中文文献反映出来的学术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外国人较早较多留意CPE(DeCamp, 1971, 1977),英语文献中CPE语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都多有可观。

CPE的语料主要记录在英语文献中。早期的语料主要见于十八十九世纪来华西人的日记、游记、战记之类的作品中,多是举例,且多都带有猎奇、否定的态度。已知最早的资料性文献,是Anson(1748)和Noble(1762),两者都记录了18世纪40年代广州、澳门等地的资料,是弥足珍贵的文献,对CPE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后代有关CPE最早的语用、语言特征等的认识,多依赖于他们。19世纪这类文献较多,从语料价值着眼,最为重要的可能是Williams(1836,1837)、Downing(1838)、Hunter(1852,1882)、Anon(1857)、Hayes(1878)、Shaw(1897)等等。20世纪最重要的文献,有Airey(1902)、Norman(1902)、Hill(1920)、Reinecke(1937)、Hall(1944)、Collis(1946)、Thompson(1958)、Leland(1977)(后者是“创作”,但被认为有极重要的价值,参考Tryon,1996)等。这些著作中,有的还尝试进行了语词考释和词典性资料书的编辑,与早期的猎奇性质不同。

由于汉字、汉语特点的限制，CPE的许多特征由中文文献无从观察，因此，英语文献是研究CPE的主要依据。但是，英语材料散见各处，迄今只有有限辑录，使得全面、深入研究甚为困难，集成性辑录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

研究方面，Dennys(1870, 1878)似乎是英文文献中最早从学术的角度涉及CPE的，他简要讨论了CPE形成的原因、过程以及语言特点、语言功能等问题。但其后相当长时间内，英文文献中的工作主要限于CPE语词的辑录、考释，如Hill(1920)。其中，Couling(1917)是第一本西人所编中国百科全书性著作，所收的CPE数量较少，但颇有参考价值。例如，林则徐致英国驻华代表律劳卑的信中，称律劳卑为“barbarian eye”。该书(P43)指出“barbarianeye”是汉语“夷目”的洋泾浜英译，并且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译，以及外国人为什么会认为带有侮辱性质。

20世纪初，Reinecke(1937)研究CPE，对其产生、发展、传播和消亡等都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并第一次进行了分期(Reinecke, 1937:772~777; Shi 1994正确地指出了其分期是基于社会学标准)，这奠定了CPE科学研究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初，Hall成为第一个主要由语言学来深入研究CPE的大家，并最终创建了洋泾浜语言学科。他的许多论著(尤其Hall, 1944, 1966)，在CPE的语料搜集和语言特征分析两方面都卓有贡献。于他是具有广阔的语言学视野的、卓有成就的罗曼语专家，加上对世界洋泾浜语言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其CPE研究，能够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归纳出CPE的具体理论和洋泾浜语言的一般理论，并把CPE与世界洋泾浜语言、世界语言联系起来。(注：Hall看到了洋泾浜语言在研究语言的产生、语言关系等方面的意义，使洋泾浜语言的研究与H. Schuchardt开创的语言接触研究联系起来，挑战了谱系发生学理论。但他本人否定H. Schuchardt的研究，参考Hall(1963: 13~14)、DeCamp(1977)和Schuchardt(1980: 1~14)Gibert的评价。)Reinecke、Hall堪称CPE研究的标志人物，后代的CPE研究者多深受他们的影响。

当代的著名CPE研究者各有特点。如P. Baker和Mühlh{}usler的研究具有广阔、深厚的语言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背景，P. Baker(1987)以及P. Baker和Mühlh{}usler(1990)是少有的力作；Bohon讨论了英语在中国的历史及不同的历史形态，考古、审音建功甚多；Holm总结了已有的CPE资料和研究进展，并把CPE与世界洋泾浜语言相结合；A. Selby和S. Selby主要专注于华南CPE的早期形态；Sebba从语言接触的立场立论，探求CPE的语言接触特征；Shi以Hall(1944)为基础，较为全面地讨论了CPE的语言特征。总括而言，在研究CPE时他们继承了Reinecke、Hall的思路，多是把CPE放在世界Pidgin、Creole和Lingua Franca大背景下，或置于语言接触背景下，结合人文、社会学科，比较、参证CPE与其他语言的同、异，探索发生学、类型学、语言接触等关系，讨论CPE语言特质及人文、社会含义，这种既根植于本体又不仅限于本体的路向，极为可取。

CPE的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都已经有了—定的基础，未来的研究不但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而且要继续拓展视野和思路。

## 二、CPE起源研究的评述与探索

中外学者关于CPE起源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流派：—源论和独立起源论(Thomason, 2001:157~221;Holm, 1988~1990, vol. 1:13~70; Arends et al., 1995: 87~134)。

—源论(monogenesis)实际上并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对有—定关联的许多理论的泛称。关于这些理论，Thomason(2001:176~177)、Holm(1988~1989 v. 1:44~51)、Arends (et al. 1995:87~134)和DeCamp(1977)都有介绍。这些理论各有特定的形态、内涵，彼此甚至可能差别甚远，但基本上都主张洋泾浜语言有—同—来源，认为歧异是分化发展的结果，由中可看到谱系论的影子。

不过，具体到洋泾浜语言如何—同—、什么层次上—同—，各种理论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跟CPE起源有关的，又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假说：(1)Whinnom(1956)首先提出的理论认为，全世界的洋泾浜语言只有—同—来源，因而CPE与世界洋泾浜语言同源；(2)—般统称为South Seas Jargon理论认为，太平洋地区洋泾浜英语有—同—来源，因而CPE与太平洋地区洋泾浜英语同源。这两种理论目前都尚缺乏充分、明晰、—致的论证，后者的可信度相对较高，代表论述有Clark(1979)、Mühlh{}usler(1986, 1996)和P. Baker(1987)等。前两者描述了太平洋地区古今各种洋泾浜英语变体之间的关系(Mühlh{}usler, 1996:28并有图示，但是又表示图中语言间关系不能肯定)，指出本地区的洋泾浜英语都与CPE有着某种关系，而CPE是最为古老的，似乎暗示其他变体由CPE发展而来。但是，他们没有直接讨论CPE的起源，没有明确指出CPE是否就是祖语。P. Baker(1987)分项目比较了这些洋泾浜英语变体，发现都与澳大利亚有关，因而提出New South Wales Pidgin English理论，认为他们可能都共同起源于澳大利亚。但是，他表示无法用谱系树来表示，似乎否定了他们具有谱系关系。

—源论为解决CPE起源提供了又—思路，发现了诸变体间的一致、相似关系，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能提出确凿的经验证据，和建立在其上的内部—致的理论范式、概念系统，未能解决所声称的共同起源问题。而如果从文化史来观察，世界的洋泾浜语言很可能是多源的，—源论用来

作同源的证据，很可能只是洋泾浜语言普遍现象，或者接触感染、共同继承、平行发展的结果。

独立起源论认为，CPE是、且仅是汉语（粤方言）与英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结果，但可能先经由洋泾浜葡萄牙语阶段。

几乎从一开始，在华西方人就把CPE看成纯粹是中、英语言接触的产物。Noble(1762)从经验的立场实际上得出了这一结论；Williams(1836)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指出CPE是中国与英国贸易所导致的，广州行商在同英国人的商业往来、日常交往中，由于不能习得标准英语，因而发明了CPE；Lehand(1892:4~6)从语音上分析了中国人不能习得标准英语的原因。后代多数学者继承了这一认识，不过具体见解可能不同，较为特别的是Hall。Hall一直坚定地认为，CPE是中英接触的产物，但其产生主要是非语言因素作用的结果。他认为，由于中英相互疏远、互有保留，因此发明了CPE，充任彼此间的沟通媒介(Hall 1955:29)；中国人能但不愿意学英语(unwilling not unable to, Hall 1966:8)，CPE是文化区别或歧视的产物。Hall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提示CPE不仅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更含有文化的因素在内，而这是大部分学者忽略了的。

CPE具有独立的起源、是中英接触的产物，早期在华外国人的这个共同见解，经过亨特(Hunter 1852, 1882)的宣传，（注：亨特又指出CPE受葡萄牙语等的影响。按：说是，但与一源论或多源论无涉。）几成定论，相当长时间内也是唯一的认识。迄今进行的CPE研究，或明或暗、程度不一地几乎都受这个认识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在这个认识下取得的。这个看法较为符合中西接触史实和CPE语言事实，但也确实还面对一些难题。例如，CPE中的若干成分，尤其是某些语词和某些句法成分，与其他洋泾浜语言有明显的一致性，需要从语言普遍现象、洋泾浜语言普遍现象、语言接触等方面进行甄别，需要从语言和人文两方面进行解释。

独立起源论框架下的各种理论，对CPE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见解，也并不完全相同，在起源地、起源时间、发明者等主要问题上，都存在着明显分歧。

起源地。Williams和Hunter都明确地指出，CPE的起源地是广州城。（注：广州当时分属番禺、南海，如十三行属南海县，黄埔属番禺县。本文以广州城指广州城区，广州指广州城及其郊区。）但是，他们的认识可能只是基于经验，并没有深入、仔细地进行理论论证。吴义雄(2000)也主张广州城说，并且从历史背景进行了一定的论证。起源地是广州城，这是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说法。

Reinecke、Hall(Hall的认识受Reinecke影响很深)则似乎认为起源于广州和澳门两地，所以Reinecke(1937)在对CPE进行分期时，把第一期命名为“在广州和澳门的原始时期”。但是，Reinecke主要从社会学进行的研究，缺乏足够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论证，而且可能还有模糊、犹疑之处，这一见解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的重视。

张振江(2004)根据中外关系史、中西通商史和文献证据，参照早期澳门与广州的相互关系和CPE的历时特征等因素，认为其最早源头是澳门而不是广州城。不过，由于当时澳门通用葡萄牙语（以下简称葡语）、洋泾浜葡语，CPE在澳门可能只是辅外语，可能使用人数极少。到了广州城时期，CPE逐渐顶替葡语、洋泾浜葡语，成为中西沟通媒介，因而起源地当是澳门、广州两地。这与Reinecke、Hall的认识相近，与传统说法不同，但得到Cheong(1997)、范岱克(2000)、Van Dyke(2000)从早期CPE使用者等方面进行的研究的支持。起源地还需要进行更周密的论证，需发掘更多的早期职业、宗族等资料。

发明者。Williams、Hunter等CPE的见证者、使用者、研究者，一致认为发明者是中国人。这个看法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当代研究者中，可能只有Holm(1988~1989:vol. 2:514)似有异议：“有证据显示中国洋泾浜英语脱胎于(grown out of)16世纪被带到中国港口的、已经洋泾浜化的葡萄牙语……最终，英国人与其他在广州经商的外国商人以及水手和他们的同行者，也开始使用这种洋泾浜英语。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发现，学习这种洋泾浜语言有其好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借助书本来学习。”似乎暗示外国人是发明者。这与使用CPE的外国人的经验相悖（如Williams, 1836, Downing, 1838, Anson, 1748, Noble, 1762），也与语言史实、语言使用材料相背离，因此不能成立。世界上的洋泾浜语言，确实多有先由西方人发明（发明者多为传教士），然后传授给当地使用者（参考Reinecke, 1937: 104~118），CPE是中国人的发明，与此不同。

文献多认为发明者是行商（如Williams, 1836）；Shi(1994)认为仆人是发明者。这两种看法都是建立在夷馆制度(Canton system)基础上，认为由于制度的限制，能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只有行商或者仆人，只有他们才可能发明CPE。但在事实上，CPE产生的时候尚未禁海，一通商、推行广州制度和严防外夷后起（1757年。参考万明，2000:382~410；朱雍，1989：序言）；当时对待外国人实际上很宽松。如Noble(1762:253)指出，虽然要求外国人只能居住于夷馆，但他们在广州城任意居住（《粤海关志》，V28, 29），城内甚至还有外国人开设的旅店(Downi



g, 1838: 31、262~271); 中英接触相当普遍, 如James Flint不仅在广州城内居住, 并且穿华服、说华语, 随意闲逛, 会见中外客人。因此, 认为只有行商或者仆人才可能接触到外国人, 与史实不合, CPE的潜在发明者并不只限于这两类人。(注: 《防范外夷五条》等规定, 外国人不得雇用华人仆人; 《达衷集》、《粤海关志》(V28)等均记有官府禁雇佣事; 英国人曾确实自带仆人(参考Morse, 1926工资单)。这一规定本及史实, 也不利于仆人发明说。又参考R. Blake(1999, Jardine Matheson: trader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ch 2)。)

吴义雄(2001)认为发明者是当时的下层华人, 但没有深入论证。张振江(2004a)认为发明者是澳门、广州的下层华人, 主要发明者是船上居民。他的主要论据是: 根据文献, 不同行业的下层华人参与了发明CPE; 根据早期中西交通史、最早与西人交往的中国人的职业和地域分布, 以及船上居民(疍家、其他渔民、海商)多会说CPE而且整体水平最高等事实, 推断船上居民在发明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船上居民最早与英国人接触, 同英国人在华生活密切相关, 英国人最早雇佣的引水、通事、买办、佣工等基本上都是他们(Downing, 1838, v. 1:103), 故他们首先发明CPE。仆人和行商只是CPE的使用者、发展者, Selby & Selby(1997)的推断根据不足。

产生时间。对CPE可能的产生时间, 学者们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看法。CPE主要是由英语、汉语接触而形成, 因此, 其产生时间不可能早于英国与中国接触的时间。根据Morse和Fairbank的研究, 英国人第一次到广州是1637年, 但1699年才真正同粤海关地区发生关系, (注: 1613年英国在日本设立商馆, 与中国沿海地区时有往来, 但对于CPE的产生, 似乎没有直接影响。)自此开始了同中国的交往, 并在1730年前后成为在广州外商的主要势力。因此, CPE产生的上限不能早于1699年。(注: Hall(1955: 28)似乎认为起源时间是1644, Thompson(见Drake, ed. 1967 241~242)认为CPE的某些语词很早即见, Airey(1902: 7)认为CPE是欧洲语言、美国英语和汉语相混的结果, 均误。)

CPE产生的下限相对容易确定: Anson(1748)和Noble(1762)分别记录了1747年时广州和澳门地区CPE的使用情况, 后者并记录了已知最早的CPE语料, 虽然它还带有浓厚的葡萄牙语味道(Anson和Noble甚至认为那时的CPE是洋泾浜葡萄牙语)。因此, 其产生时间不能晚于1747年。

CPE产生于1699年到1747年之间, 但对具体的产生时间, 学者们仍有分歧, Morse和Shi代表了两种主要的认识。Morse(1926, v. 1:66~67)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 认为CPE产生于1715年,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明确给出的时间。但是, 他没有给出确切的证据以证明何以定于此年, 他的说法少人信从。(注: Reinecke(1975: 543)指出: “Other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date(指1715年) may be too early”。按Morse是非常严谨的学者, 所言必定有据, 但是似乎迄今为止尚无人知道他的根据何在。)Shi(1994)意识到一种语言难以于某一年内突然产生, 推定CPE产生年代是1699年到1747年之间, 很可能是1715年前后, 但他也没有给出产生于1715年前后的明确理由。

张振江(2004a)认为, 史实表明, 至1720年时, 广州商行通事通用的语言仍是葡语、洋泾浜葡语。但到了1732年, 澳门赴广州的通事, 就由派葡语通事改为派英语通事, 说明商行通事已以英语沟通中西。详细地分析了相关历史文献、范岱克的历史研究成果和英国势力1730年前后在广州的主体外国势力等史实, 结合对早期CPE语料和使用情况的分析(参考Noble, 1762:214~219), 他推断1699年到1720年是CPE的萌芽期, 1720年至1730年是CPE形成并开始稳定存在的时期。至于确切、特定的CPE产生年份, 他认为无法指出。

最终解决CPE起源诸问题, 一方面要借鉴其他洋泾浜语言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要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区域经济史、地方志、家族史等的研究成果。

### 三、CPE传播研究的评述

CPE传播的研究,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考察: 人际传播、空间传播。

到目前为止, 认真的人际传播的研究极为稀少。较早记录、论及的, 主要是在华西方人士, 反映的多是广州、澳门的情况。Noble说广州小商人派孩子给外国人当仆人以习得英语、CPE; Williams、R. Morrison和Hunter都指出, 广州有教授CPE的书本流传; Downing(1838)指出广州此书相当多、流传相当广。此外, 他还指出, 广州有人靠教授CPE为生, 这与Williams、R. Morrison的记载一致, 但更详细。不过, 教授CPE的“老师”常常都很贫困, 因为学生刚学会一点点就再也不来学习, 而靠学会的只言片语谋生去了。Downing(1838, v. 1:280)所描写的, 很可能就是个这样的学生, 与香港开埠初期类似(参考Fok, 1990 ch. 4)。如此看来, 在当时的广州, 顺应社会需求、以“学校”教育为手段的人际传播途径, 已经建立起来, 虽然既不正规、又不稳定。

张振江(2004b)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中文水平(当时是依照汉字来教、学的,例如,教、学的不是dinner,而是“煎拿”),通过“学校”途径系统学习CPE的,必定只有极少一部分。Selby & Selby(1997)说行商及其子弟中的部分人借助于这样的途径,应是乎情理的猜测。Holm(1988~9:v. 2:514)所描述的,也应是循此途径。大部分中国人当是通过与外国人接触而学会CPE的。这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Williams(1836)所描述的直接接触:“(中国人)整天呆在十三行、小铺头以及所有其他外国人常常出没之处,很快他们就能够用东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文献中颇多此类记载。二是借助于工作同外国人直接接触,这恐怕是多数中国人习得并提高CPE水平的主要途径。文献中记录的通CPE的有名的人物,大都经由此路,著者如鲍鹏。这也解释了Williams和Downing所发现的广州城、黄埔、伶仃三地的差距。广州城内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少,故广州人的CPE较差;黄埔以及走私圣地伶仃,中外频繁接触,故中国人的CPE较好。

上海等通商港口初期的人际传播的方式,也极少有人认真讨论。张振江(2004b)认为,其情况大略与广州相同。梁启超曾论当时“读书人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上海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3页。)可能有过激之处,但也确实反映出英语、CPE在上海的传播,主要不是借助书面、学校的途径,而主要通过直接同外国人接触而习得。这样习得的英语、CPE,对促上海中西沟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甚至帮助一些人成了当地名流,如名买办徐润。实际上,通过书面、学校途径学习的成效极为可疑。例如当时影响极大的《英语集全》,“主要适应广东人”,未必真能给上海人多少帮助;当时上海的英语补习学校虽然颇多,但教授的多是CPE,而且结果是教与学两面均尴尬,高明如J. Frey只能徒呼负负(Wakeman, 1966有小说化描述)。名买办郑伯昭痛感其弊,因而重金送其子孙留洋学英语,请英籍女教师登门教授其女、媳英语(徐茅, 1996:38)。

由此可以说,当时中国人习得CPE主要是经由直接接触,这与CPE是一种口语正相合。以口头形式为基本方式,没有书面形式的支持,(注: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75)说:“相传本埠互市之初,吾人以英文之音尚易学舌,而二十六字母屈曲蜿蜒,苦摹仿,乃择字典部首之点画勾撇,指定二十六式以代字母之音。此项字体在道、咸之交颇流行。”按,此说是,但这只是一种替代形式,且流范围有限。)既是CPE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其消失的主因之一。

对CPE来说,空间传播更加重要。如Reinecke(1937:95)和Hall(1944)所指出,在被传播到了通商五口等地之后,CPE才迎来了全盛期,充分发挥了作为沟通中西的作用。

Reinecke(1937)对空间传播最早进行了描述,但他是基于社会学的角度,而且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吴义雄(2001)也略有提及。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张振江(Zhang, 2003, 2004b)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指出空间传播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就迅速开始,(注:类似的传播早已存在。但或传播范围有限,或者不是传自广州,本文不讨论此类。)主要的路线有三条:向香港传播;向中国内地传播;向太平洋地区的传播。前两条传路线决定于英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而向太平洋地区的传播,则得益于华人移民。

鸦片战争前,CPE已经传播到香港,不过只限于走私鸦片的极小区域使用。英占香港后,广州的外国人迁到香港,依赖外国人为生的一些华人也随之迁港。最初流人的多是疍民,1842年时占全部流人华人人数的2/3、全港华人人数的近1/2,疍民因而在传播CPE方面起了重大作用(Zhang, 2003:ch. 5)。1856年,广州等地华人相继避乱来港,自此形成了香港华、洋两大社会。这两大社会都缺乏通晓对方语言的人才,CPE继续充当双方行政、商业、日常甚至司法沟通媒介(Norman, 1902, Lindley, 1866, Norton-Kyshe, 1971),直到20世纪中叶它才退出(Luke & Richard, 1982)。但至今仍留下一些印记,如把“L”念成“elo”,“Z”念成“iset”,等等(张振江2001, Thomson, 1961)。此外,由于各自的方言迥异,早期来港华人也有借助CPE以沟通的。虽然这较为少见,但是中国人之间只有借助CPE才能通话,让英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因而英人著作中数度提及(Zhang, 2003:ch. 5)。

第二条路线是向中国内地的传播。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迅速扩散至通商口岸,渐次进入武汉、北京、天津等地区。Reinecke(1937:781~82)认为CPE没有影响中国北部,误。当时外国人通中文的极少(Pritchard, 1970:39~40),如Noble认为,只有一名外国人可算合格的中文翻译。Hunter认为只有三个外国人通汉语。因此,外国人把在广州为他们服务的操CPE的华人带到这些地区帮忙。这些华人由于广州制度的解体而谋生困难(Hao, 1970:67),也愿意远走他乡充当外国商行的翻译和买办,甚至成为外国资本的合伙人。据考证(Hao, 1970:51),最早到内地的是一个阿三(Asam)的广东人,先由广东到香港,1844年到上海,担任英国怡和洋行的分行买办。广东籍的通事、买办纷至沓来,(注:Hao, 1970、丘传英主编《广东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106~112),均有代表性洋行买办的籍贯、工作年限等资料表。广州与上海,是中国早期接触英语的两个主要地区,故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多吴腔、粤调。)到19世纪70年代,王韬《瀛需杂志》(卷1)仍说上海的买办“半皆为粤人”。最出名的当为香山人吴健章,原为1832年开设的“通顺行”行商,到上海后借助外国势力最后当了苏松太道。广东籍人士到了新的地区,仍用CPE,教授给当地人的也是CPE。因此,各地的CPE有统一的来源,都带有明显的粤方言特色。(注:但当时社会看不起CPE及广东通事,曾泽、李鸿章等的指责典型地反映出时人态度。参考《齐如山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6040~6057)、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不著出版社, 1985)。)但是,粤方言毕竟与其他汉语方言有差异,按照粤方言音记的汉字,依照其他方音来读,可能会与源词的读音有较

距离。例如comprador（买办）粤方言区通常音记为“金不多”，但吴方言“金不多”的读音却与comprador相距甚远。翻译、买办以粤籍人为主时，这种差异不是问题，但是到了本地人士为主时，就不再可忽视了。结果，上海的音记形式被改成了“康白度”，竹枝词中就是“洋行办康白度”。传播开来之后的CPE，慢慢地开始了分化。

第三条路线超出了国境。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准许人民合法地迁移，粤方言区人民主要从香港迁移到北美、夏威夷、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Bauer, 1975: 63ff; Reinecke, 1937:783)。太平洋诸岛洋泾浜英语的来源之一，就是这些华人移民带去的CPE，因此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洋泾浜英语与CPE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由于当时美国需求劳工，相当多的华人迁移到了美国，分布于旧金山等若干地区，形成了唐人街等华人聚居区。一般而言，聚居有利于华人的风俗、语言等习惯的保留，这些华人从中国带来的CPE，也因此唐人街维持下来，被作为lingua franca与用英语的人士沟通。在唐人街中，CPE被广泛使用到20世纪初才大体上销声匿迹(Bauer, 1975:63ff)。不仅如此，这些华人还把CPE中的某些成分成功地运用入标准英语，甚至成为后来美国英语的日常用法。例如(Hall, 1955: 30)，“long time no see”、“look-see”（CPE的读音为“k-si”，如I'll go have a look-see），等等。

传播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努力，研究得较为清楚的是传播大势，而对于具体的机制、过程，等等，所知极少。借助于相关地区工商业发展史、移民史、家族史、语言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和个案调查史料，是取得扎实进展的主要途径。

#### 四、CPE语言特征研究的评述

从CPE研究史来看，关于CPE语言特征的研究，大体上是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的：与汉语、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关系；与汉语、英语的关系。

CPE主要是由中、英两种语言来源的成分构成的，不论对CPE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公认这一点。但是，CPE中也确实含有汉语、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来源的异源成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主要体现为葡萄牙语、南亚和东南亚一些语言来源的语词。

在华外国人中，Anson(1748)、Noble(1762)、Williams(1836, 1837)、Hunter(1852, 1882)等早就发现了这些异源语词成分，Williams(1836)和Hunter(1882)并且分别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在CPE之前的更早时期，澳门和广州一带曾经较为广泛地存在过洋泾浜葡萄牙语，而这种语言被中西双方共同用来充任中西沟通的语言媒介。这种洋泾浜葡萄牙语的某些语言成分，主要是语词，在中西沟通语言从洋泾浜葡语向CPE转化的过程中，被掺杂进后者，成为CPE的异源成分。

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也有认识。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印光任、赵儒霖是最早系统注意到葡语、洋泾浜葡语在华传布的中国人，他们合著的《澳门记略》中专门著有《澳译》一篇，记述通行于澳门及其周围等地区华人中的源于葡语的语词，这本书和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是中国人写的葡语、洋泾浜葡语在华传布较早的材料。此外，其他人也时有提及，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2，广东6）说当广州、香山一带的华人“效番衣服、番音”；中山籍的徐润在《香山徐氏宗谱》（卷7）也说当时的香山华人“半通夷语”，等等，这些实际上也都是关于葡语、洋泾浜葡语传播的描写。不过，他们都只是注意到了现象，而未能上升到理论的层次。

早期中外人士主要关注的是洋泾浜葡语的语词，Williams(1837)并且进行了统计。根据他的记录材料，这种语词共有1200个（又参考Knowlton 1961）。Reinecke(1937)和Hall(1944, 1955)分别从社会学、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探讨，确认并进一步丰富了早期中外人士的经验的认识。Reinecke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演变大势；Hall具体比较前、后期CPE的用词差异，论证了CPE中英语来源的词汇与葡语来源的词汇之间的关系。Hall认为，从一个方面看，CPE词汇构成的历史变化之一，就是英语来源的词汇逐步顶替掉相应的葡语来源的词汇，他并且简要地举例说明了这种顶替过程。试以“大”、“小”为例（资料来源：Hall, 1944:95。“→”符号表示顶替）：

（英语来源big/large>）big/larg(i)→grandi（<葡语来源）

（英语来源small>）smolo→pikinini（<葡语来源）

表示“大”、“小”的词，在初期CPE中是葡语来源的grandi、pikinini。例如(Noble, 1762:240)：

“Carei grandi gola? Pickenini gola?”（“要大的？要小的？”）

“Grand。”（“大的。”）

“Pickenini。”（“小的。”）



但到了中、后期CPE中所看到的，就是英语big/large、small来源的洋泾浜形式big/larg(i)、smolo。经由这样的过程，英语来源的成分迅速增加，而葡语来源的成分迅速减少。当然，葡语来源没有完全退出，仍有小部分留了下来，若干语词并且成了CPE的构词成分，如著名的“Jo's”“神”。

CPE中有洋泾浜葡语的成分，这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至于CPE是否“脱胎于16世纪被带到中国港口的洋泾浜葡语”（Holm, 1988~1989, v. 2:512），即两者间的演化关系如何，尚无一致的认识，学者们的见解分成两派。一派认为，CPE是在澳门及其周围地区存在的洋泾浜葡语直接演化的结果。如Thompson (1959)认为，CPE由在澳门的洋泾浜葡语转化而来，而澳门的洋泾浜葡语，又是从西非辗转而来。（注：世界各地曾经相当多地存在过不同的洋泾浜葡萄牙语，本文所及只是其一。Schuchardt似是最早详细研究世界范围的洋泾浜葡萄牙语的。其后说法纷纭，但基本上都认为洋泾浜葡萄牙语成于各航海港口、葡萄牙殖民地。有人认为异源成分在葡萄牙即存在，航海行话形成于葡萄牙本土，随葡萄牙人航海而传播开来。详参考Naro (Language, 54: 314~347)、Goodman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v. 2: 149~162)。）另一派则认为，CPE虽然深受洋泾浜葡语的影响，但与洋泾浜葡语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中的葡语词汇成分是借词，或者是语言混杂的结果。后说可能较为符合实际，但在借词过程、混用过程以及顶替过程等方面，仍只有一些示例性的说明，缺乏周详、明晰、有力的论证。

此外，这种洋泾浜葡语对CPE的词汇影响较大，而一般认为它对CPE的语法、语音的影响较小，个中的原因，也未见认真讨论。在我们看来，这个特点似乎与CPE形成的过程有关，似乎也可以从中考见这两种语言交替过程的若干关系。

学者们都认为CPE中另有一小部分来自南亚和东南亚语言的语词。但是具体是哪些词语，意见较为分歧。而关于这些语词融入进CPE的解释牵涉得更加广泛，学者们的看法也相距更远。概括地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

1971年，Robertson根据世界航海史和各地洋泾浜语言多有大体相同的语言成分等事实，提出了航海行话理论(nautical jargon theory)，认为中世纪后海员来源复杂，不同国籍的海员在创造统一的航海行话时，把各自的母语语言成分带进了这个共同的航海行话中。因此，航海行话成分多元，来源多元，受航海行话影响而产生的洋泾浜语言，也必然有多种语言的成分。依照这个理论，CPE中的南亚和东南亚语言成分，是本土航海行话影响的结果。

另一方面，自Williams、Hunter等在华外国人开始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CPE中的南亚和东南亚语言来源的词语，主要是表示重量、货币单位的名词，是借词的结果。这些词语先是被在南亚、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借用到葡语中，然后又由随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英国人接着使用。葡萄牙人、英国人相继到达中国后，就都把这些语词带到中国，并在洋泾浜葡语、CPE中继续使用。

两种说法中，后一说法可能解释力更强。但还需要进一步对比各种洋泾浜语言，进一步梳理世界航海史、西方殖民史，尤其是其远东殖民史，才可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既然公认CPE主要是由汉语、英语密切接触而形成的，那么，它与汉语的语言特征、英语的语言特征的关系如何？

这方面的经验认识、示例性说明很早就有，但是认真的研究却开始得较晚。接触过CPE的人士由经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一般都认为CPE的句法结构与汉语的句法结构“完全一致”（“in exact accordance”，Eames, 1909:82），或者极其接近于完全一致。Leland(1892:1~6)的说明，可以认为是这一认识的代表性见解。

Hall的观点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他从语法方面进行的比较是最早的深入研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继1944年的研究之后，Hall在1952年依据他所获得的语料，检查了CPE的57项句法结构，并据此与汉语、英语的语法相比较，第一次得出了量化的结论。他认为，在CPE的句法结构中，全为汉语句法结构的占全部受检项目的5%；更接近汉语句法结构的占7%；属于中、英两种语言共同的句法结构的占51%；18%的句法结构为英语所独有，16%的句法结构更近英语；此外，另有4%的句法结构是CPE自己的独立发展，与英语、汉语的句法结构都不相同。据此他认定CPE“无疑更接近英语”（Hall, 1952:142）。1962年，Hall又进行了新的研究，基本观点并无改变。

Hall这个结论与通常的经验认识相去甚远，也与其他洋泾浜语言的语法特性截然不同，令人生疑。因此，Hall的结论虽然得到了一些学者支持（例如Holm, 1988~1989:516），但是，大多数研究CPE的学者并不认同，他们相继提出了自己的各种意见（如P. Baker, 1987, Bauer, 1974, Clark, 1979, Shi, 1991）。其中，Shi的研究相对最为全面。1991年，Shi把18、19世纪CPE的一部分语言材料，同汉语、英语进行了全面语法比较。根据从词法（形态，包括屈折、派生）、句法（包括短语结构、疑问句结构、祈使句结构、话语层次分析）两大方面比较研究的结果，他认为，CPE采用的句法结构，基本上全是依照汉语（粤方言）语法，少数是汉语（粤方言）、英语共有语法特征的简化，而并未发现纯为英语语法及其简化形式的成分，因此，CPE更接近汉语。这个结论与Hall的结论恰恰相反，但是符合传统的说法、经验的认识，也更符合当今世界洋泾浜语言的一般语法规律。

语言间的远近亲疏关系，不能单单根据语法来判断。即使是只根据语法，也要至少有大体完备的语言材料才可判断，而现在，诚如Reinert (1975)所指出的，还无法充分占有CPE材料。在目前，我们只能大概地说，二说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是，二说都只是假说，都还不是定论，他们所据的材料不同和母语背景的影响，可能是形成歧义的主要成因。

此外，随着洋泾浜语言研究的深入，当代学者发现，迥然不同的洋泾浜语言之间，却多有一些共同的语法规则。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正是洋泾浜语言某些未知的本质特征的反映（有人概括成“洋泾浜语言普遍语法”理论），因此，不具边缘语法特征，与具体接触的语言的语法特征无关（参考Biekeron, 1973, 1981）。假如按照这一思路，对CPE许多语法问题的看法，可能就要更改。例如，传统的基于经验的看法认为，称劳卑为“barbarian eye”，显然是按照汉语“夷目”语法结构组词的结果（barbarian, 夷；eye, 目），而与英语语法或其简化形式毫不相关，CPE语料中，此类例甚多，因此，CPE更近于汉语。但是，不可能有渊源关系的不同洋泾浜语言，也都通例多有这种结构（如Melanesian pidgin English），如果根据洋泾浜语言普遍语法，那么，这只是普遍现象，而与具体接触的汉语、英语无关，因此，不能据此贸然断定CPE与汉语关系更近。洋泾浜语言普遍语法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一个未定的问题，但它至少提示CPE研究者应该更多层次地考虑问题：究竟哪些是汉语语法影响，哪些是英语语法的影响，哪些是自己的语法的独立发展，哪些是洋泾浜语言共同的语法特征，这些都不能仅从汉语、英语、CPE本身来判断，更不能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来判断。

CPE的语言特征当中，首先引西方人侧目，也最易为人注意的，是其“古怪”的发音。对CPE的语音系统，Hall、Lin和Shi等人较为详细地进行了讨论。其中，Hall (1944, 1952, 1966)的坚持不懈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系统的研究。他按照英语分析方式（即元音、辅音分析方式）而非传统的汉语分析方式（即语言的声韵调分析方式），第一次归纳出了CPE的11个单元音、24个单辅音的语音系统，并讨论了CPE音节结构特征。此外，他还讨论了CPE对英语有而汉语没有的音的处理情况。例如，他指出：对英语有而汉语没有的复辅音，CPE按照三种方式予以替换简化，而在这种替换、简化过程中，粤方言的语言特征起了重大限制作用。1991年，Shi在借鉴了Hall的成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定的补充、修正性研究，对Hall的语音系统进行了一定的删改，但与Hall的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Hall和Shi两人实际上都认为CPE没有声调，因此，他们都只归纳出了CPE的元音系统、辅音系统，而没有声调系统。他们的认识与文献中记载的当时中外人士的基于听感的认识相合，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一般认为，CPE的发音系统是符合汉语的习惯的，而汉语是有声调的，粤方言的声调尤其多，为什么CPE没有声调，无论是他们两人，还是其他的早期在华外国人、后代学者，都没有认真讨论过。

Hall和Shi的研究为我们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是，他们的结论仍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Hall (1944:96)归纳的辅音系统有[b]、[d]、[g]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正确的，但是肯定不是完全正确的。CPE的语料主要是由英、美人士记载的，Hall根据的语料也是来自美国人，对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来说，发[b]、[d]、[g]等音毫无困难，认为英、美等国人士所说的CPE有这些辅音合乎情理；而汉语完全没有这些浊辅音也实在难以想像当时的中国人能够准确掌握，因而难以想像中国人所说的CPE的辅音系统，真的会有这些辅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时存在着两种CPE：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说的CPE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士说的CPE。本文不能详细讨论这“两种”CPE的同、异，但可以肯定地说，有“两种”CPE的说法在CPE文献上是完全找不到充分根据的。因此，他们主要的不足之一，是没有考虑母语背景造成的语音差异。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所据的材料都有较大的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据我们的观察，CPE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它被传播开来之后，有证据显示，不同地区使用的原本同一来源的CPE，逐渐有了一定的分化，形成了一定的、类似于方言的地域性差别；P. Baker项目论证了1743~1944年间CPE语法的历时变化，语音上同样也应有时间上的不同。实际上，已知的CPE语料中，18世纪到20世纪文献上的拼写，有一定的变化，反映出特定语词的具体读音有变化（Hall, 1966专章论述了拼写与实际音值的问题）。

其次，在Hall研究这种语言时，语言学界对洋泾浜语言的认识还少，因此，他的某些论断也可以根据今天的认识重新讨论。例如，在现代洋泾浜语言学看来，英语的齿间清擦音（[θ]）和相应的齿间浊擦音是有标记项，在英语与其他语言接触时，这两个音基本上一定会被替代。这是一种语言普遍现象（Ferguson & Debose, 1977），因此，这种替代与发生接触的具体语言无关。他们在CPE中的被替换，自然也就不是如Hall



说的，是受广州话语言特征的限制。

关于语音，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即CPE的语音特征与英语语音特征、汉语整体的语音特征、汉语粤方言的具体语音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似乎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与三者的异同、远近关系；三者对其语音特征的制约；不同于三者的独立发展；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共识更少，例如，Hall(1944)认为，广州方言对CPE语音特征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吴义雄(2001)却认为，是汉语的语音特征而非仅是广州方音的特征对其起了重大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在CPE中，语音、语法的作用相对较小，起最重要作用的是语词。那么，按照常理，CPE语词的研究应该受到最大的注意、取得最大的成果。但是，实际上却相反。

CPE到底有多少语词，这些语词与汉语、英语是什么关系，迄今没有研究清楚。作为一种受限制的有限语码，CPE的功能有限、语域有限，习见的自然语言有相当的不同，因此，认为CPE语的词数目比通常的自然语言的数目少得多（参考伊佐基，1989:83），这肯定是极有道理的。但是，少到什么程度、CPE到底有多少语词，却仍然无法据此来判定。Hall根据他自己的研究认为，世界上“一般的洋泾浜语言的词汇量都很小，大约是只有六百到一千五百之间”。（注：转引自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游汝杰等中译本，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P94）。）这个认识有极大的真实性，但即便如此，这个说法也只能作为估计、统计CPE语词数目时的一个基本的参考，却不能据以定论。而且，这个估计数目从六百到一千五百，相差一倍有余，具体操作时候也很难掌握。从已有的成果来看，不同的学者根据各自所掌握的CPE语料文献所作的统计，出入也很大。例如，吴义雄(2001)统计了一本“鬼话”词典，有词语380余个；Williams说他所见到的“鬼话”词典，一本只有不超过400个词语，一本则多达3000多个语词；Hall(1955:29)则认为，他接触到的CPE语词，有700个左右。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词”、“语”（词组）的取舍不同，更可能是由于所据材料多少的不同。去掉“语”的部分，Bauer(1975:63ff)估计CPE共计有750个左右的单词，假如接受Hall引文的看法，那么Hall、Bauer的估计可能比较接近实际。但是，在语料仍然极为缺少的目前，还难以下定论，距离比较确切地统计出这种语言所拥有的语词的数目，还有漫长的路。

CPE的语词中，英语来源的最多，汉语来源的次之，另有一小部分如葡语、南亚、东南亚诸语言来源的成分，这一点早就成为共识。但是，已有的相关论证，都只是举例说明性质的，迄今未见到对CPE的语词构成进行穷尽性的分析、分类。因而，远没有确切地知道CPE中汉语来源的、英语来源的、其他语言来源的词语，到底各有多少。Bolton(2003)完备地分析了《通用红毛番鬼话》的语词，并初步探明了其语源，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没有进行。这方面不尽如人意的一个原因，可能是CPE的语料稀少、分散，难以完备搜集，自然无法准确统计、分析。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已知的CPE词语的考释、回译极为困难。考释词语并还原成源语(source language)，是进行CPE词汇研究的关键，也是进行如判定CPE与汉语、英语之间的语言关系等工作的基础，但是，由于语音的改变、简化、适应等诸多变化，已知语词源语的认定，常常是各说各话，源语变得扑朔迷离。例如，（注：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正文，P16~17，章文钦校语）。）“张西老”转成西文形式的“Chang Si-Lao”后，竟然可以被相当多的汉学家回译成汉字形式“郑芝龙”，由中不难想象考释、还原成源语、判定其来源的难度。

此外，分析CPE语词的语源时，涉及的源语言为数众多，学者们在认定属此属彼时，难免各有自己知识上的局限。而且不同洋泾浜语言之间，语词的平行共见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更加大了判定难度。例如，包括CPE在内的相当多的洋泾浜语言都有“bilong”一词，虽然学者们对此词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但是，它究竟是汉语来源的，还是英语或者别的什么语言来源的，仍然难以决定。已有的这种源语判定工作，如Selby & Selby(1997)、周振鹤(1996、1998)和Bolton(2003)，都是主要集中于汉语、英语来源的词语的考辨、还原；除了极少数特别语词之外，洋泾浜语言间平行共见的语词来源的判定，基本上都还完全没有涉及，需要极其艰巨的努力。

中国洋泾浜语的语言特征牵涉面广、认识难度大。已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一部分材料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要扩大材料涵盖面，同时注意与其他洋泾浜语言的参照、对比。

## 五、结语

CPE已经有300年左右的历史。初期，人们把它看成一种不三不四的胡乱拼凑的语言，认为“这种杂七杂八的语言十分之荒唐可笑，实在没使人打起精神来认真看待它。就算是顶顶重要的事情，只要一用它来说，也就变得滑稽无比。中英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当时没有获得认真的对待呢？（使用这种语言）就是原因之一”（Collis, 1946:137）。如果以之与当代的评价相比较，如Hall(1955)、Balzer(1999:10)，其间距离以道里计。

如同评价的转变一样,中国洋泾浜英语的研究也早已今非昔比,研究水准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国外学者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代世界语言学中,包括CPE在内的洋泾浜语言的研究、语言接触的研究,已经成为研究的主流之一,而且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加强。中国是这种曾经在中西沟通方面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的语言的故乡,中国学者理当充分发掘、利用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互相参证,借鉴国外学者的长处、成果,开阔视野、胸襟,迎头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 【参考文献】

- [1] 陈松岑. 1985. 社会语言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陈原. 1979. 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M]. 香港: 三联书店.
- [3] 1983. 社会语言学[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 [4] 1994. 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5] 范岱克. 2000. 利用珠江三角洲的文化遗产发展澳门和广州的贸易往来[Z]. (未刊).
- [6] 梁嘉彬. 1999. 广东十三行考[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 [7] 松浦章. 1983. 清代前期中英海运贸易研究(中译)[J]. 中外关系史译丛(3).
- [8] 万明. 2000.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的比较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9] 2001. 中葡早期关系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0] 吴义雄. 2001. “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M]. 北京: 近代史研究, (3).
- [11] 2001.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12] 萧致治, 杨卫东. 1986. 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3] 许地山. 1969. 达衷集[M]. 香港: 龙门书店.
- [14] 徐茅. 1996. 中国十买办[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5] 伊佐基. 1989. 社会语言学演讲录[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6] 叶蜚声, 徐通锵. 1981. 语言学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 游汝杰, 周振鹤. 1986.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8] 印光任, 张汝霖. 1992. 澳门记略(赵春晨校注本)[M]. 澳门: 澳门文化司署.
- [19] 章文钦. 1994. 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初探[A]. 见欧初. 岭峇春秋(一)[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0] 张海鹏. 1995. 徽商研究[M]. 安徽人民出版社.
- [21] 张振江. 2001. 粤港澳语言关系[A]. 许锡辉、李萍. 粤港澳文化互动关系[C].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22] 1999. 广东语言的人类学研究[A]. 黄淑娉. 广东区域文化与族群关系(第5章, P76~180)[C].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4a. 中国洋泾浜英语的起源[Z]. (未刊).
- 2004b. 中国洋泾浜英语的传播[Z]. (未刊).
- [23] 周振鹤. 1996. 随无涯之旅[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殊言异语.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 [24] Adler, Max K. 1977. Pidgins, creoles and lingua francas: a sociolinguistic study[M]. Hamburg. Buske.
- [25] Airey, F. W. I. 1902. Pidgin Inglis talks and others[M]. Shanghai: Kelly & Walsh.
- [26] Anon. 1857. Canton English[Z]. Household Words 15:450~452.
- [27] Anon. 1860. The Englishman in China[M]. London: Sounders, Otley & Co.
- [28] Anson, G. 1748(1974).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MDCCXL, I, II, III, IV[A]. [comp. by] Richard Walter and Benjamin Robins[C]. edited with an intro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9] Arana-Ward, Marie. 1978.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Macanese: the Portuguese-based Creole of Macao[D]. M. A.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30] Arends, J. & P. Muysken, N. Smith(eds.) 1995. Pidgins and creoles: an introduction[M]. Amsterdam: J. Benjamins.
- [31] Baker, H. D. R. 1994. The chop suey connection: Hong Kong [M].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32] Baker, P. 1987.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English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Pidgin Englishes of the Pacific Region[J].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2:163~207.
- [33] & P. Muhlansler. 1990. From business to pidgin[J].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1:87~115.
- [34] Ball, J. D. 1903. Things Chinese; or, Notes connected with China[Z]. Hong Kong: Kelly & Walsh.
- [35] Balzer, T. [et al.] 1999. Pidgin phrasebook[Z]. Hawthorn, Vic.: Lonely Planet.
- [36] Bauer, A. 1975. Das Kanton-English: ein Pidginidiom als Beispiel für ein soziolinguistisches Kulturkontaktph nomen[M]. Bern: Lang.
- [37] Bickerton, D. 1973. On the nature of Creole continuum[J]. Language, 49:640~649.
- [38] 1975. Dynamics of a creole system[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9] Bland, J. O. P. 1929. English as she is wrote in the Far East[J]. English Review, 48:711~719.

- [40] Bolton, K. 2003. Chinese Englis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1] 2002a. Cantonese Englishes[J]. *World Englishes*, 21(2): 181~198.
- [42] Byrne, F. & J. Holm(eds.)1993. *Atlantic meets Pacific*[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 [43] Byrne, F. & T. Huebner, 1991.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s of Creole languages*[M]. Amsterdam: J. Benjamins Pub.
- [44] Cannon, P. S. 1936. The "pidgin English" of the China coast[J]. *Journal of the army educational corps*, 13:137~140.
- [45] Clark, R. 1979. In search Beach-la-mar: toward a history of Pacific Pidgin English[M]. *Te Re*, 22:3~64.
- [46] Cheong Wang Eang. 1997. *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M]. London: Curzan Press.
- [47] Coates, A. 1966. *Macao and Britain: 1637~1842*[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8] Collis, M. 1946. *Foreign mud*[Z]. London: Faber.
- [49] Couling, S. 1917.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Z].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 [50] DeCamp, D. 1977. 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and pidgin studies[M]. In Valdman 1977.
- [51] DeCamp, D. & I. F. Hancock(eds.)1974. *Pidgins and creoles*[M].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52] Dennys, N. B. 1870. "Pidgin" English[J]. *Nation* 11:118~119. 1878. "Pidgin" English[J].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AS*, 2:168~174.
- [53] Downing, C. T. 1838.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M].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 [54] Drake, ed. 1967. *Symposium on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on Souther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Hong Kong Region*[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55] Eames, J. B. 1909. *The English in China*[M]. London: Pitman.
- [56] Fairbank, J. K. 1953.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57] 1960.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58] Ferguson, C. A. & C. E. Debose. 1977. Simplified registers, broken languages and pidginization. [M]. In A. Valdman (ed.), pp.117~118.
- [59] Fok, K. C. 1990.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M].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 [60] Gow, W. S. P. 1924. *Gow's guide to Shanghai*[N]. Shanghai: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TD.
- [61] Hall, R. A. 1944. Chinese Pidgin English[J].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4:95~113.
- [62] 1952. Pidgin English and linguistic change[J]. *Lingua*, 3:138~146.
- [63] 1955. *Hands off pidgin English*[M]. Sydney: Pacific Publications Pty.
- [64] 1958. Creole languages and genetic relationships[M]. *Word*, 14:367~363.
- [65] 1966.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 Y: Itaca.
- [66] Hancock, I. E. 1975. Malacca Creole Portuguese: Asian, African or Europe? [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7:277-294.
- [67] Huttar, G. L 1975. Sources of creole semantic structures[J]. *Language*, 51(3): 684~695.
- [68] Hao, Yen-ping. 1965. *Cantonese comprador-merchant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 [69] 1970.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M].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70] 1986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71] Hill, A. P. 1920. *Broken China: a vocabulary of Pidgin English*[M]. Shanghai: Hill & Weiss.
- [72] Holm, J. A. 1988-9. (ed.) *Pidgins and Creoles* (vol. 1, 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3] Hunter. W. C. 1852. *Bits of old China*[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 [74] 1882.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he Treaty days, 1825~1844*[M]. London: Kagan Paul, Trench & Co.
- [75] Hymes, Dell H. 1971. (ed.) *Pidginization and creolization of languag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6] Kachru, B. B. 1983.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M]. Germany: Pergamon Press Ltd.
- [77] Knowlton, E. C. JR. 1961. Pidgin English and Portuguese[J]. In F. S. Drake(eds.) 1967, pp. 228~237.
- [78] L. 1893. English as she is spoken in China[J]. *Chinese Repository*, 20:203~204.
- [79] Lehiste, I. 1988. *Lectures on language contact*[M]. Cambridge: M. I. T. press.
- [80] Leland, C. G. 1977. *Pidgin-English sing-song*[M]. Mich: Scholarly Press.
- [81] Lindley, A F. 1866. *Ti-Ping Tien-Kwoh*[M]. London: Day & Son.
- [82] Liu, Chia Chin. 1984. *Chinese Pidgin English: origin, usage and problems*[J]. MS. New York University.
- [83] Luke, K. K. & Richard, J. C. 1982. English in Hong Kong: functions and status[J]. *English World-Wide*, 3(1): 47~64.
- [84] Morse, H. B. 1908.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 [85] 1926.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e to China, 1635~1843*[M]. Oxford: Clarendonpress.
- [86] 1910~1918.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v. 1, 2, 3).
- [87] Mühlh usler, P. 1986. *Pidgin and creole linguistic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88] 1996. *Linguistic ecology*[Z]. London: Routledge.
- [89] Norman, F. M. 1902. "Martello Tower" in China, and the Pacific in H. M. S. "Tribune," 1856~1860[Z]. London: G. Allen & Unwin.



- [90] Noble, C. F. 1762. 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Z].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and P. A. Dehondt...and T. Durham.
- [91] Norton-Kyshe, J. W. 1971.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M]. Hong Kong: Vetch and Lee.
- [92] Reinecke, J. E. 1937. Marginal languages[D].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93] 1975. (ed.) A bibliography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M].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94] Schuchardt, H. E. M. 1979. The ethnography of variation[M]. Ann Arbor: Karoma Publishers.
- [95] 1980.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6] Sebba, M. 1997. Contact languages: pidgins and Creole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97] Selby, A. & S. Selby 1997. China coast Pidgin English[M]. Hong Kong: JHKBRAS, 35:113~142.
- [98] Shaw, W. J. 1897. Canton English[J]. The New Review, 16:545~555.
- [99] Shi, D. X. 1991. Chinese pidgin English: its origin and linguistic features[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1): 1~40.
- [100] Smith, C. T. 1967?. Schools and scholars [Z]. [S. l: s. n., 196-]1985. Chinese Christians [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1] 1995. A sense of history[M].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 [102] Thompson, R. W. 1958. Let's take Hong Kong's words[M]. The China Mail, 10 May to 18 Oct. 1958.
- [103] 1961. Exotic preference the lexicon of English as spoken in Hong Kong[J]. In Drake (ed.), 241~243.
- [104] Thomason, S.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105] Trudgill, P. 1986. Dialects in contact[M]. Oxford: Blackwell.
- [106] Tuck, P. 2000. (ed.)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 (10 vols)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107] Valdman, A. 1977. (ed.). Pidgin and creole linguistic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08] Van Dyke, P. A. 2000. Pigs, chickens, and lemonade: the provisions trade in Canton: 1700-1840[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12(1).
- [109] Wakeman, F. E. 1966. Strangers at the gat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10] Weinreich, U.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M]. London: Mouton.
- [111] Whinnom, K. 1971. Linguistic hybridization and the "special case" of pidgins and creoles[Z]. In Hymes (ed.).
- [112] Williams, S. W. 1836. Jargon spoken at Canton[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428~435.
- [113] 1837. Gaomun Fan Yu Tsa Tsze Tseeuen taou, or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6:276~279.
- [114] Zhang, Zhenjiang. 2003.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arly Hong Kong(1841~1884)[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文章录入: djd 责任编辑: djd

- 上一篇文章: 《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述评与探

 网友评论: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 100006 传真: 65133283